

论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

彭玉斌

摘要:作为一个文艺统战组织,“文协”决非普通的文艺团体。本文将“文协”在渝期间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放在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面考察,概括出其团结协作的广泛性、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坚持斗争的持久性和组织存在的战时性,旨在揭示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并为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性参照。

关键词:“文协”;主要特征;深远影响;历史性参照

中图分类: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2005)01-0105-05

作者简介:彭玉斌(1976-),男,四川万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102)。

自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8月内迁重庆,它就以重庆为活动中心,密切团结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开展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战文艺运动。作为一个在硝烟弥漫中诞生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文协”在重庆的活动虽是战时的,但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却无疑是深远的。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由“文协”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可以说,在色彩斑斓的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文协”无疑是其中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那么,这道风景的魅力究竟何在?“文协”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又具体是什么?其在渝活动的历史过程对新重庆的文化建设又有何借鉴?这些都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一、“文协”在渝主要活动扫描

为了深入探讨重庆抗战文化地图中的“文协”景观,有必要先对其在渝主要活动进行一次简单扫描。

从总体上说,“文协”在渝主要活动,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从“文协”总部1938年8月迁渝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为“文协”在渝活动前期。此时,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但“文协”仍然活动频繁,成绩也十分显著。

从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文协”在渝活动中期。在此期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集中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相应调整了政治路线,对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削弱和围剿,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文协”活动内容的转折点。事变之前,“文协”以“抗日救亡”为主;事变之后,则以“抗日争民主”

为主。虽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和阻止破坏下,“文协”的活动有所减少。但“文协”并没有知难而退,偃旗息鼓,而是灵活调整斗争策略,机智勇敢地在逆境中坚持斗争。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5年10月“文协”易名为“文协”在渝活动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内战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国。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文协”着重开展了争取民主、和平,反内战和清查附逆文人的斗争。1945年10月21日“文协”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尽管此时“文协”的一些活动尚在进行,《抗战文艺》直到1946年5月才终刊,但作为一个以“抗战救亡”为活动宗旨的统战组织,“文协”因其易名而不复存在。

具体而言,“文协”在渝主要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建设。“文协”总部迁入重庆后,继续推进全国各地分会的筹备成立工作。经过长时期的筹备,成都分会、桂林分会、贵阳分会、延安分会、三台分会等先后宣告成立。不仅如此,“文协”的组织建设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历史过程,直到1945年1月,还有“江西赣州分会”和“三台分会”宣告成立。此外,为适应文艺大众化和抗战文艺出国运动的需要,“文协”还增设了“通俗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进一步健全了“文协”的组织机构,为充分发挥其对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

(二)编辑出版。除了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外,“文协”在重庆还开展了一系列编辑出版活动。首先,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出版条件更加困难的情况下,

本文是重庆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重庆文化与重庆抗战文学主流”(项目编号:2001-ZWF08)的部分成果,课题主持人:靳明全教授。

文协在重庆继续坚持编辑出版会报《抗战文艺》。《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国统区发行最广、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进步文艺期刊，也是唯一贯穿抗战始终的文艺刊物，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文协”总会还编辑了“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以及纪念鲁迅先生特刊，与香港分会合办英文杂志《中国作家》，与成都分会合办通俗文艺刊物《通俗文艺》等。这些编辑出版活动，加强了“文协”总会和各地分会的联系，密切了广大会员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更好地团结起来，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向纵深发展。

(三)战地慰问。“文协”在重庆组织或参与了一系列战地慰问宣传活动。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是其中重要的活动。1939年6月4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重庆生生花园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了出发仪式，并致辞勉励。访问团经过长途跋涉，主要访问了中条山和太行山两个战区，历时半载后才返回重庆。此外，“文协”还派人参加了南北两路慰问团的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加强了前线和后方的联系，增进了作家对战地生活的了解，对战地文艺宣传起了重要作用。

(四)理论探讨。“文协”总部由武汉迁渝后，在研究部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多次诗歌、小说、戏剧座谈会和晚会，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文艺中的典型形象创造、歌颂与暴露、作家主观和现实生活客观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并及时纠正了创作中的不良倾向，为抗战文艺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国际宣传。“文协”积极推动抗战文学“出国运动”，在内迁重庆后，继续加强国际宣传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积极开展国际宣传活动。“文协”1939年2月2日理事会做出决议，组织成立“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此后，抗战文学出国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对苏宣传方面，决定除经常翻译中国抗战文艺作品交塔斯社转苏联各报章杂志刊载外，并有系统地筹备一个中国抗战文艺专号，由《国际文学》杂志同时用八种文字出版。而在面向英美的文章出国运动方面，出版部以全力有计划的介绍中国抗战文艺到欧美各国去，先后在英国出版了《中国抗战小说选》，在美国出版了《抗战诗选》，还用世界语在匈牙利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选集》。这些文学作品在外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好评，同时提高了中国抗战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地位。

(六)反专制争民主。“文协”总部迁渝后，随着国民党专政独裁的阴谋日益暴露，“文协”联合其他文化团体灵活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对国民党文化专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首先，“文协”利用纪念高尔基、鲁迅、屈原以及罗曼·罗兰的活动，宣传进步文艺，倡导向黑暗势力勇敢斗争的精神。其次，“文协”还通过为知名

文化人士举行祝寿活动，宣传他们的斗争精神，号召广大文化人士与黑暗统治进行斗争。例如，“文协”为郭沫若、茅盾、老舍、洪森等人举办诞辰纪念会或创作生涯纪念会的活动，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权同室操戈、破坏抗日的罪行，歌颂了不畏强暴、反抗专制的精神。再其次，“文协”还通过“援助贫病作家运动”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对文化人的摧残迫害，既密切了广大社会人士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系，也抨击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此外，“文协”还团结广大文艺界人士，直接抵制专制文化政策，要求取消审查制度，争取民主，保障作家合法权益。

这一系列活动既是“文协”在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直接体现，也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组织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的凝聚作用。也正是在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重庆固有的本土文化不断获得了量的丰富与质的嬗变。

二、“文协”的主要特征

综观“文协”在渝期间的主要活动，可见，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统战”就是“文协”的根本性质。而在复杂的抗战环境中，这一根本性质又表现出以下四个主要特征。

(一)团结协作的广泛性

作为一个广泛团结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抗战救亡而并肩战斗的统战组织，“文协”在团结协作方面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这是由“文协”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广泛性是以前的任何文艺组织、社团、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等都不及的。这种空前的广泛性首先体现在“文协”会员和理事的广泛代表性上。

“文协”成立大会上，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500余人，广泛代表着全国各地各党派各流派以及自由主义作家、无党派民主文化人士等。而从“文协”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来看，更是充分地体现出了这种团结协作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关于这一点，曾担任“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干事的胡绍轩先生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从理事名单来看，完全体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的局面。其中有“五·四”时期就蜚声文坛的元老，同时也有30年代才活跃于文艺界的新秀。在政治观点上，有国共两党的作家，也有无党派作家。就文艺社团和文学思想流派而言，有自1921年1月成立后，提倡文艺以反映现实人生为主，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两员主将沈雁冰(茅盾)和郑振铎，以及该会12名成员之一的许地山；有“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有提倡革命文学，于1930年3月成立的声势浩大的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的阳翰笙、夏衍、张天翼、穆木天、楼适夷、姚蓬子、沈起予……^{[1](P19)}

郭沫若也曾对此作过极高评价：“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2]这就结束了自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中国文艺界派别林立，论争迭起，众声喧哗、各自为阵的局面。在抗战救国的总目标下，全国文艺作家“不分畛域，不分思想观点，不记旧仇新怨”^{[11](P19)}，都团结在“文协”这一面旗帜之下，组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敌文艺大军，广泛代表了不同派别、政治倾向的作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战斗。

其次，这种团结协作的广泛性还体现在“文协”活动范围的广泛上。“文协”内迁重庆后，继续对全国文艺界抗战文艺运动进行组织领导，在全国各地广泛发展会员，组织分会，先后成立了“襄阳分会”、“宜昌襄樊分会”、“成都分会”、“延安分会”、“桂林分会”、“昆明分会”、“贵阳分会”等几十个分会以及分会性质的组织。“文协”第一次年会据组织部报告说：“惟经一年来的艰苦奋斗，组织的规模，已初具雏形；全国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作家，名记者……已大率由于情感的融洽，时代的感召，责任的督促，踊跃入会……”。可以说，“文协”的组织遍布了全国，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也被选为“文协”第三届候补理事，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此外，“文协”还同一些国外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记者如俄国的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美国艾德加·斯诺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借助他们将“文协”的抗战文化延伸到国外，共同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摇旗呐喊。

（二）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文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从其产生的政治前提以及活动宗旨看，自始至终都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文协”是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实现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文化统一战线组织，“统战”既是其基本性质，又是其政治目的。

其次，从“文协”的活动宗旨来看，初期以“抗战救亡”到后期以“抗日争民主”为活动宗旨，这都充分体现出其鲜明的政治目的性。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为“文协”的成立而题词：“统一文艺阵地，巩固精神国防。”^[3]这可以说一语中的，道出了“文协”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再其次，从“文协”组织内外的斗争来看，也充分说明了它鲜明的政治目的性。“文协”作为广泛团

结文艺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并不意味着其内部就不存在矛盾和斗争。这一点在“文协”组织领导的人选上也可见端倪。根据“文协”会章规定，理事会不设理事长，由担任总务部的常务理事对外代表本会，对内领导全会工作，实际上等于会长。由于“文协”是一个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作家的组织，如果由国共两党的某一位党员作家出来领导工作，都不合适。老舍无党无派，而且，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作家中又有一定的声望，因此由他出来总揽全局，非常恰当。据田仲济回忆：“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意见安排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恰当的。”^[4]这既是团结的需要，更是斗争的需要。此外，进步文化人士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从没停止过。“文协”成立后，国民党企图以文化来装点抗战门面，并控制“文协”，为延其治效力。因此开第一届年会时，叶楚伧在讲话中说：“现在文艺家可以说是整个的了，但还不够，还没有把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进一步说，要能调整文艺宣传的机构，使中宣部、政治部和文艺界协会很合理的配合起来，那力量的发挥必然很大。”郭沫若则在讲话中巧妙地给予反驳：“我以为要实现各位的指示及大家在文章中所企望的事，主要的还是在于物质条件，无论我们的精神如何充分，如无物质条件，也还难以实现。……政府能以实力给予‘文协’帮助，这样才能谈得到实现计划，否则所有的文章与言论都将归于空谈了的。”当然，“文协”的内部斗争还远不止此。这些都说明它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目的性的文艺组织。

（三）坚持战斗的持久性

“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与民族危亡生死攸关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就决定了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具有持久性。“文协”从其成立到易名终结，持续斗争了近八年之久，其会刊《抗战文艺》则成为唯一贯穿抗战始终的文艺刊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协”是在重重困境中坚持战斗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的。除了经济上的极端困窘，更有政治上的无数非难。老舍在《“文协”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认为造成“文协”在工作上存在四点缺陷的原因时说：“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座谈会亦足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这就充分说明了“文协”活动中的经济政治双重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对于这么庞大的文艺组织来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坚持斗争的持久性也是“文协”不同于其他一般文艺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文协”成立五周年时，郭沫若说：“几经迂回曲折，有些组织已经在无形中匿迹消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继

续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庆贺的事。”

(四)组织存在的战时性

“文协”于1945年10月21日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从此，以“抗日救亡”为活动宗旨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文协”不复存在。作为一个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为抗日救亡而发起、组织并指挥抗日文化运动的文艺组织，“文协”因抗战全面爆发而产生，因持久抗战而继续存在，因抗战结束而易名终结。这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组织存在的战时性。

“文协”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结果，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应运而生的。它的活动宗旨就是抗战救亡宣传。这也是它将全国文艺界各种力量团结起来的唯一共同目的。“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正是这一共同政治目的成为凝聚各种民主力量的巨大磁石，逐渐将文化界的爱国人士集中到“文协”这一组织中来。既然抗战救亡是“文协”活动的宗旨，那么为了救亡就必须坚持抗战，抗战就是其存在的基础。“文协”初期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围绕抗战而进行的。皖南事变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文协”的活动以“抗日争民主”为主流，但始终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到抗战胜利时，“文协”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致力于抗敌宣传的目的达到了，“文协”也就失去了这唯一存在前提。作为一个文艺组织，“文协”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没有共同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它能将各种不同流派、党派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唯一前提就是抗战救亡。这一政治目的一旦达到，“文协”的历史使命也就已经完成，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因而其组织生命也就随之终结。自从它改名去掉“抗敌”二字，也就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文协”了。

这些鲜明特征正是“文协”之所以能够不辱使命，紧密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并肩战斗的独特魅力所在。只有牢牢抓住这些特征，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文协”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它对重庆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必然性。

三、“文协”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文协”作为一个因战争而产生、因战争而存在、因战争而易名、以抗战救亡宣传为活动宗旨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其在重庆的存在虽然是暂时的，或者说具有鲜明的战时性，但其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首先，“文协”总部内迁重庆，标志着重庆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正式形成，这就直接提升了重庆文化在全国文化地图上的地位。

1937年12月，由于战局影响，国民政府机构相继

内迁重庆。次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及留在武汉的政府机构也随后迁入重庆。1939年5月5日，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城市地位的变化，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形成，为重庆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为重庆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提供了政治前提。中共南方局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这一公开合法的名义在重庆开展工作。而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又同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这就为当时在渝的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不分党派继续团结抗战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随着重庆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变化，重庆文化中心的形成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国家机关相继迁入重庆，大量的文化机构、文化团体也先后迁到重庆。1938年8月，“文协”总部随国民政府和大批组织机构和文化团体内迁重庆，客观上为重庆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从此，“文协”就以重庆为活动中心，领导和团结全国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开展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战文艺运动。“文协”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团体无法企及的广泛而充分的代表性。因而，它的内迁重庆，标志着重庆作为战时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

其次，“文协”总部、分部的大量会员以及紧密团结在“文协”周围的许多文化团体、文艺界人士随“文协”总部的内迁而来到重庆，直接改善了重庆的文化素质结构，丰富了重庆文化的内涵，冲破了原有重庆文化的区域性局限，使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多样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剧增，1937年约47万，1938年底即达60余万，1941年突破70万，1943年接近90万，至1945年初已逾百万。而根据1937年重庆户籍统计，当时重庆户籍涉及全国25省，在47万总人口中，重庆外籍的人口占了近24万。这些新增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作为文化的综合载体，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口所携带的文化因子，相互撞击、交融，就使得重庆文化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貌。而作为“文协”会员的大量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大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以及团结在“文协”周围的大量文艺工作者、科学家、学者等无疑承载着更加密集的文化因子。他们的到来直接改善了重庆的文化素质结构。同时，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而带来的不同区域文化同重庆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不仅丰富了重庆文化的内涵，还增强了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以及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文协”在重庆发起组织或参与组织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丰富了重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同时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

当“文协”总部迁入重庆后，其作为全国抗战文化指挥中心，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

为深远。在重庆，“文协”更广泛地团结文化界人士和文化团体，推动抗战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文协”不仅组织了多次诗歌、小说、戏剧座谈会和晚会，探讨抗战文艺创作理论，还两次举办了通俗文艺讲习班，培养文化后备队伍，继续出版《抗战文艺》，加大宣传力度，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直接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比如，由“文协”发起的“诗人大赛”纪念活动，由“文协”参与组织的“戏剧节”等。“文协”还通过纪念高尔基、鲁迅以及为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老舍、洪森、茅盾祝寿等活动来推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文化运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也同时丰富了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

第四，“文协”成立专门机构，创办专门性刊物，为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这些活动，促进了重庆文化的传播，扩大了重庆抗战文化的影响，加深了世界对重庆的了解，也为重庆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文协”迁入重庆不久，即着手组织“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由王礼锡、胡风、戈宝全、徐仲年等任筹备委员。1939年初，“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负责“文协”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并组织了一批翻译家有计划系统地介绍中国抗日文艺作品出国，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出国运动，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重庆抗战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文协”除通过自己的会刊《抗战文艺》进行对外交流和宣传外，还通过致书致函举办各种演讲会、座谈会、欢迎会、纪念活动等加强与国际文化界的交往。“文协”成立之初就发布了《告世界文艺家》、《致日本被压迫作家的公开信》，由盛成、戈宝权等人译成英、法、德、俄、世界语等文字发表于世界各大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也同时扩大了重庆文化的影响。1940年8月，“文协”致书世界作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不设防城市及与军事无关的民宅、商店、村庄、文化机关滥施轰炸的罪行，吁请齐声声讨。1944年6月6日，“文协”发布《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书》，指出，“在人类解放史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就是法西斯崩溃的前奏，欧洲人民的解放就是亚洲人民解放的枢纽”。^[5]也正是在反对世界人民共同敌人——法西斯强盗这一战斗背景下，中国以重庆为中心为代表的抗战文化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中国抗战文艺出国的同时，“文协”也十分注重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介绍到国内，除了通过其会刊译载世界反法西斯作品外，还通过各种座谈会、演讲会、报告会介绍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文化和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注。比如，1939年1月，“文

协”举行茶话会，王礼锡报告欧洲文艺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1940年12月21日，“文协”儿童文学组又举行了报告会，欧阳予倩报告各国儿童戏剧发展概况。1940年4月14日，“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第三次诗歌晚会并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此外，“文协”还组织了罗曼·罗兰追悼大会和纪念高尔基的活动。正是在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中，重庆抗战文化走向了世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和其他优秀文化也走进了中国，走进了重庆，为重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总之，“文协”在重庆的存在虽然是短暂的，但其对重庆文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绚丽多姿的重庆文化地图上，抗战文化无疑是其中最为壮丽的一座高峰。而“文协”则是这一高峰上最为壮丽的一道景观。作为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中枢，“文协”在渝活动对改善重庆文化的结构，丰富重庆文化的内涵，推动重庆文化向多元、互渗方向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假若没有“文协”在渝时期的活动，重庆抗战文化这座高峰便远没有那么雄伟壮丽，而重庆文化地图上的文化景观也就不会如此绚烂夺目了。这也是区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超越固有的区域性局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获得更加强烈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一个历史范例。这对于新重庆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组织概况[J]. 抗战文艺: 第4卷. 1939. 1.

载1939年4月25日《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

载1939年4月25日《抗战文艺》第4卷第2期。

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第146、17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老舍:《文协的过去与将来》，载1946年5月4日《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载1943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载1938年3月27《新华日报》。

参见薛新力著《重庆文化史》第261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 胡绍轩.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A]. 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C]. 成都出版社, 1990.

[2] 郭沫若. 新文艺的使命[N]. 新华日报, 1943-3-27.

[3] 谭洛非主.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76.

[4] 曾广灿等. 老舍研究资料(乙种)[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344.

[5] 苏光文. 抗战文学纪程[M].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78.
(责任编辑: 王黎明)